



# 梁章钜与《文选旁证》

□刘昆庸

梁章钜(1775—1849年),字闳中,又字蓴林(亦作“蓴邻”),晚号退庵居士,为清中后期嘉、道间名臣。所著《楹联丛话》及《巧对录》等,是楹联研究的开山之作。其著述中成就最高者,则推《三国志旁证》和《文选旁证》,为毕生心力所萃的巨著。

传统目录学根据源流和属性,将文献著述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曾国藩又依功用和表现总结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劝学篇直隶士子》)四类。《文选》属“集部”的辞章之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学总集,由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故又称《昭明文选》。这部书是皇室出面,召集当时文章名家,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为标准,将先秦迄至南朝齐梁时期的诗词歌赋,选粹汇集为一编,可说是唐以前文章精华的总集。

后代视此书为辞章渊数、写作范本,备受文人士矚目。杜甫教儿子作诗,就说要“熟精《文选》理”。到宋朝,士人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从唐代开始,兴起了专门研究此书的“文选学”,简称“选学”。唐高宗时李善为此书作注,为当时选学的集大成之作。稍后玄宗朝出现了吕延祚等五人的“五臣注”,“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四库总目提要》),以解说通俗而行为世,亦颇有参考价值。此后很长时间,选学基本不出李善与五臣注的范围。

至清代,对传统典籍的研究,以文献的整理考订见长,学风质朴笃实,号称“朴学”。选学在这一时期有极大发展,著作众多,成就跨越前代。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有“文选学家”十五人,注明“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此处所举只是“有论著校勘者”,并非全貌。这也可见,选学的修养已成士人群体的根柢和共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者为抨击文言喊出“选学妖孽”的口号,也从反面说明选学在清代乃至整个古典学术的地位和影响。

令人费解的是,张之洞所举清代十五

位有著述的选学家中,并无梁章钜的名字。而在《书目答问》“集部”一类,则明白地列出了“《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并注明作者和版本:“梁章钜,榕风楼刻本。”《书目答问》作为指示治学门径的目录书,在士人学子中享有声望,其对梁章钜和《文选旁证》的标注,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心的暗示,颇耐人寻味。

如果是后者,则大致有两个原因,关涉学术史的观念与史实:一是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秩序,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当时的观念,以治经史为正宗,所以朴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隶属经学)和史学方面。风气使然,集部的研究不免为主流学术所轻。梁章钜在史学上有《三国志旁证》的大著,但在大师辈出的清代学界,并未得到重视,而《文选旁证》作为集部之学,更被轻视则自不待言。

另一个原因,是有传闻说《文选旁证》非梁章钜所著。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记有此说,认为是梁氏购得他人手稿加工而成,因为“以中丞(即梁氏)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沈曾植也持类似看法(见李详《媿生从录》)。因梁氏虽著作等身,在经史领域却没有被主流重视的成果,有人误认为其学力不足,难以完成《旁证》这样的大著,遂有作者为他人的传闻。

这两点疑问,应当稍加辨析。首先,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以儒家治国、以经学取士的现实,使经学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学术门类。若以学术价值独立的现代观念重估古典学术,如《文选旁证》这样的辞章学巨著得到重视,当属实至名归。

至于著作权问题,应根据史料综合辨析。梁章钜在自订年谱中说,他在甲戌(1814年)四十岁时,因公务滞留运河上百余日,于是取旧时读《文选》的笔记整理增订,正式开始《旁证》的撰著。到戊戌(1838年)六十四岁,全书四十六卷完成并付梓,“盖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书”。戊戌是

道光十八年。《文选旁证》最早的刊本注明是“道光甲午榕风楼刻本”,甲午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好是二十年。由此可知,此书始撰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写成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并付印,又用了四年才完成四十六卷巨著的刊刻。

梁章钜的著作始于整理旧笔记,则他对《文选》发生兴趣的时间,要再往前追溯。他在《自序》中说:“束发受书,即好《选》。仰承庭训,长更明师,南来北往,钻研不废。”束发为成童之年,即十五岁。从十五岁爱好研习,到六十四岁刻成《文选旁证》,前后历五十春秋。所以其三子梁恭辰在重刊此书的跋中说:“先中丞公著作甚多,于《选》一书致力者五十年。”这是映于儿子眼中父亲生涯的缩影,细节准确,饱含深情。

现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梁章钜批校的《文选》,是明代汲古阁刻本,书的页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可见其用功之勤与积学之深。这部书还只是梁氏平时阅读《文选》用的本子,不是他正式著述《文选旁证》的工作底本。他在自序中说:“最后得鄱阳师(胡克家)新翻晋陵尤氏本,乃汲古之祖。其中异同,均属较是。”说明他在正式撰述时,采用了最后得到的胡克家翻刻尤氏本。此本较汲古阁本为早,校勘精审,至今都是公认的最好版本。可以想见,从孩童时的爱好,到成年后的撰述,梁章钜经手校阅的《文选》不止两三部,每一部都不知通读细玩过多少遍。

古人有十年磨一剑之说,而梁氏在《文选》上用了数倍于此的时间,五十年钻研,二十年著述,撰成《文选旁证》。其书“博采唐宋元明以来各家之说,计书一千三百余篇”(阮元序)，“中间凡八易稿”(《凡例》),成书约一百二十万字,其工作量之巨大,所贯注的心力与精神,令人叹为观止,肃然起敬。一部著作凝结了那么多心血,要冒名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在梁氏的自订年谱、《文选旁证》“自

序”“凡例”与“引用书目”中对著作心得的甘苦自知之言及友人的记述,都是对他著作《文选旁证》的有力证明。又,他在文中引述少时父亲和叔父的指授讲解,与师长友朋切磋商榷的心得,只能出于自撰,无法假手他人。所以后代书目文献的著录,对梁氏的著作权多无异议。

阮元赞誉此书“沈博美富,又为此书(按,指《文选》,下同)之渊海”,朱寿亦称其“真于是书能集大成者”。阮、朱皆是当时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据梁氏《凡例》自述,著作过程中多与前辈同仁切磋交流,其中就有这两位。他们为梁章钜《文选旁证》作序,高度评价其人其书,无疑是对梁章钜著作《文选旁证》最有力的背书。

《文选旁证》的成就,体现在考据和辞章两个方面。书名“旁证”,通于“旁征”,取旁征博引之义,可见作者对此书的定位,首先是资料广博周全。此书考证注释,以李善注为底本,汇集后代校释,对《文选》的版本校勘和文本解读,都集前人成果之大成。又注重师说,一些梁氏曾得其指教的大家如段玉裁、纪昀的评校意见,仅存于此书。

文本的解析,作者详人所略而略人所详,比对异同,综合旧说,而裁断必出于己。对旧说常有发挥,见解超越前人。如宋玉《神女赋》中历来“王”和“玉”两字因字形相近而误,导致是楚王还是宋玉梦见神女,后世一直有两种说法。梁章钜结合版本考证与文本细读,推究历来“王”“玉”二字互变之迹,辨明原文是宋玉夜梦神女而对楚王言其状,彻底纠正了历来的误读。全书类此者甚多,考证细密、抉微章句,兼具史识与文心,美不胜收。

《文选》是唐前辞章的宝库,梁章钜的《旁证》不啻是打开这一宝库的锁钥。此书经穆克宏先生点校,2022年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八闽文库·要籍选刊”出版,为最善本。有志于选学者,持此一编,可一睹选学之大观。(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 《典籍里的中国》:阅读的再媒介化

□叶勤

近日,《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收官。从《尚书》到《备急千金要方》,两季节目共选“读”了22本古代典籍,内容不仅覆盖作为国学主流的文史哲医,也涉及作为旁支的农工兵地等领域。随着节目的播出,《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水经注》等冷门古籍也登上热搜榜——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电视与阅读的关系。

关于电视与阅读,可能最为人知的说法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的:“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作为著名的媒介研究者,波兹曼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娱乐至死”几乎被视为电视的原罪。但近年来涌现的电视文化节目新浪潮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见字如面》《朗读者》《一本好书》等节目已先行探索了阅读的视听化,将阅读从不可见的思想交流活动外化为可见可闻的朗读、讨论以及话剧表演,并带动《月亮与六便士》《万历十五年》《时间简史》等书籍跻身畅销榜。

《典籍里的中国》更进一步将古籍阅读用“多幕剧+演员朗读+专家座谈”的方式加以演绎,用故事和形象来诠释古籍记载的内容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阅读的精髓——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被电视用其所擅长的方式呈现出来。电视,似乎已经救赎了自己的原罪。

其实,电视并不必然排斥阅读;相反,

电视可以帮助阅读“回归”其所来处。阅读本来就是对最原始的言语传播活动的继承与超越,通过将言语转化为文字,刻写在或轻便易携或坚固长存的各种材质之上,便可将言语内蕴的思想传诸远方或后人,使思想的交流超越“传受双方须同时在场”的限制。而电视在运用电子手段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的同时,又将阅读还原为人与人的交谈,从而再现思想交流的具体语境与气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电视是对言语与阅读的“再媒介化”。

所谓再媒介化,指的是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有某种继承关系。新媒介会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与内容,且新旧媒介之间还会相互借鉴的现象。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强烈的再媒介化特性:它将戏剧“改造”成电视剧,它对歌舞节目进行“直播”,最早的新闻节目也是从“读报”开始……电视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它更倾向于对那些以言语和身体为媒介的传播活动进行再媒介化,表现在当前的电视文化节目新浪潮中,就是大量运用身体化的表演形式(如话剧、歌舞、曲艺、杂技、武术等),并辅以时尚化、年轻化的手法来重新演绎中华传统文化。

就《典籍里的中国》而言,原本借助文字媒介的阅读,主要是被再媒介化成借助身体媒介的话剧表演,这首先是为了让古籍所记载的文化信息变得通俗易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阅读都是一种最为高效也最为经济的信息传播方式,但这种高效是以写作和阅读的门槛为代价的,尤其是经历了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之后,符号的意义

被遗忘或被替换,对于古籍的阅读就变得困难起来。例如《尚书》里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短短12个字,不仅文字古奥,而且高度概括,于是在节目中,这12个字被反复吟诵,并被再媒介化成一分钟短剧,让观众以耳闻目睹的方式,直观地感受大禹治水并划定九州疆域的宏大气魄。

在话剧表演中,身体成为交流的媒介:不仅演员的身体是传播文化的媒介,观众的身体也被调动起来成为接收文化的媒介。《典籍里的中国》的观众席与表演区相互嵌套,当演员表演之际,观众所调动的不仅有视觉听觉,甚至还有触觉(台面的震动)、嗅觉(人物的气息)等需要身体在场才能获得的感受,从而弥补了传统阅读所欠缺的具身感知,获得对历史场景的沉浸式体验,从而更加全面地接收人物和场景所传递出的情感氛围、时代特质和文化精神。

传统的话剧表演并不追求场景的逼真性,也就忽略了场景的表现力和传播力。而电视对于阅读进行再媒介化的另一个着力点就是场景化,从《一本好书》到《典籍里的中国》,场景的创新屡屡带给观众以震撼。

《一本好书》用围绕观众席的环形及多层舞台解决了换景问题,舞台的不同区域与负面的角度平衡自己的读书生活,总想着尽可能地让书籍投资这件事情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为此,买书得有所控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往往是精挑细选,可买可不买的书尽量不买;再有,就是尽力把家里买来的书一本本地读下去,买来不读肯定是负债,而读过之后,负债没准就会变为自己的资产。

让书籍更好地成为自己的资产,不

应该读,最好是读有所获。以前读书,只顾埋头阅读,读得高兴成就,如今越来越感到不能仅仅停留于阅读“输入”,还必须要有吸纳后的“输出”,这样才能实现读书的有效转化。于是养成了读书做笔记的习惯,读的过程中也努力要求自己带着问题去主动思考。这么一来,有的书读过之后化为了笔下的一篇文章,有的书中的观点为自己的某篇文章提供了相应支撑,而当这些书评、文章陆续亮相于各种报纸杂志时,它们真就给我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

由此,买书、读书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从中收获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变现,更有认知的提升、思想的丰盛,而无论是变现的收入还是精神的成长,它们统统得益于书籍,不啻为书籍投资后所得的资产。



# 让书籍成为资产

□周虢虹

我自小喜欢读书,还是学生那会儿,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加之当时出版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真正属于自己的书很少,只能向周围同学借书来读,或在课余时间到学校那个不算大的图书室去读。当时就想,等自己以后有钱了,一定要多买地买书,想买哪本买哪本!

及至参加工作,终于实现了财务独立,得空逛书店、买书,成了生活中最为惬意的一种享受。尤其随着网上书店的日益繁盛,有事没事上网看到中意的书籍随手下单,不仅能不少的折扣优惠,而且足不出户就有快递送上门,实在是再方便不过了。就这么着,渐渐地买的书越来越多,一整面墙的书架里挤挤挨挨尽是书。即便如此,仍

有许多书实在塞不下,只能任由其横七竖八散落于房间各个角落。

诚若有句话所说,“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虽说书籍在家里渐趋泛滥,然而种种原因所致,读书的速度始终没有同步跟进,读书欠债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时,内心还不免有一些焦虑,随着书债愈欠愈多,竟也就习惯成自然。

那天读一本叫《高效阅读法》的书,作者的一句话令我耳目一新,“在使用金钱上,我认为再没有像书籍这样棒的投资对象了”。以前只觉得书就是用来读的,是满足自我精神需求的一条途径,根本没想过把它当作投资对象。那些买回来后迟迟未打开来仔细阅读的书籍,或者读得走马观

花根本无所助益的书,说到底只能视其为当前的负债。经过了长久以来的“买买买”,我的读书负债依然不小。

看待书的视角变了,所采取的应对之策不免随之改变。如今,我时不时地从资产与负债的角度权衡自己的读书生活,总想着尽可能地让书籍投资这件事情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为此,买书得有所控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往往是精挑细选,可买可不买的书尽量不买;再有,就是尽力把家里买来的书一本本地读下去,买来不读肯定是负债,而读过之后,负债没准就会变为自己的资产。

让书籍更好地成为自己的资产,不

应该读,最好是读有所获。以前读书,只顾埋头阅读,读得高兴成就,如今越来越感到不能仅仅停留于阅读“输入”,还必须要有吸纳后的“输出”,这样才能实现读书的有效转化。于是养成了读书做笔记的习惯,读的过程中也努力要求自己带着问题去主动思考。这么一来,有的书读过之后化为了笔下的一篇文章,有的书中的观点为自己的某篇文章提供了相应支撑,而当这些书评、文章陆续亮相于各种报纸杂志时,它们真就给我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

由此,买书、读书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从中收获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变现,更有认知的提升、思想的丰盛,而无论是变现的收入还是精神的成长,它们统统得益于书籍,不啻为书籍投资后所得的资产。



## 《从万历到康熙》

朱永嘉 著 李春博 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明代后期财政问题及社会演变讲起,叙述明朝灭亡与清朝建立的经过,以及清初巩固统治、加强对边疆地区控制的具体情况,重点在于总结明亡清兴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的一个典型案例,作者借此提出探索并走出一条跳出周期率的新路的见解。

## 《收入不平等》

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 著 周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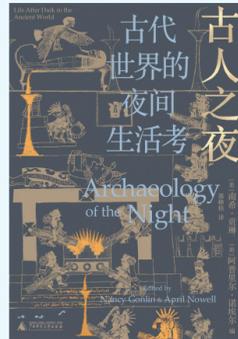


贫富悬殊不仅让穷人生活艰难,而且也让富人深受其害:社交焦虑日渐加重、不断怀疑人生选择、被迫卷入竞争漩涡、备受心理疾病折磨……从身心健康到暴力犯罪,从教育成就到预期寿命,几乎所有事情、所有人都受到贫富差距的心理负面影响。任何关心自己生活质量的人都应该对这一深刻发现感到震惊: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健康、不幸福、不安全和不善良。

## 《古人之夜》

南希·贡琳 阿普里尔·诺埃尔 著 郭峥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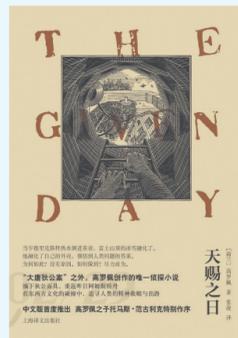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夜间考古学”领域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文集,本书为我们呈现了北美20多位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涉及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古罗马文明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书中阐述了古人的就寝方式、夜间仪式与照明、夜晚的文化意象和星座与建筑、夜间生产活动、神话故事之间的联系,带领我们进入古代世界的“夜之国度”,点亮一直被学者忽视的那片暗夜。

## 《天赐之日》

高罗佩 著 张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是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系列之外唯一一部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既有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普通人艰难生活的叙写,包括种种现实与心理困境,同时还有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思想的考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中,追寻人类的精神救赎与出路,从中折射出高罗佩本人所具有的多重文化人格中重要的一面。